

【近代史研究】

由姊妹而同学：基督教与近代上海女学校、女学生

陈 雁

【摘要】教会女校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进入中国，得益于从欧美来到中国口岸城市的女传教士们，她们将在母国所受的教育与中国女校这个发挥她们自主与理想的性别空间有机结合，挑战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女教传统，开创了“女子有才始有德”的新型性别观。很快，中美女教士们共同组成女校经营团队，将明清时代“闺塾师”们所开拓的女性文人的社会空间进一步拓展。19 世纪 50 年代前后新式女学在江南出现，随后迅速发展，促使中国女子教育与女性社交网络的形态出现了大的转变。新式女校推动女子教育走出家门，女学生藉由女校建立起了相互扶持的新型社交关系——同学。

【关键词】基督教；近代上海；女学校；女学生

【作者简介】陈雁，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2-0137-08

对现代女性而言，同学无疑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圈子之一；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同学”这一社交纽带只是男性的特权。高彦颐（Dorothy Ko）在《闺塾师》一书中为我们呈现了江南的闺秀们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存方式，尤其是职业女性作家、女塾师以及围绕她们所形成的多种形式的江南女性社团，大大颠覆了我们对于传统中国女性教育程度、教育传播途径的刻板印象。高彦颐笔下的这些江南知识女性，“通过阅读和书写，来自不同年龄群和不同家庭的女性，组成了一批社交网，从正式的、长期的和为人所知的，到私人的、暂时的和默默

无闻的。这些女性——母亲、女儿、远房亲戚、朋友和邻居——通过某种女子特性自愿结合到了一起，这一女子特性是置于其他交往准则如亲属关系之上的”〔1〕。李国彤在《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一书中也从女教、女学及妇女启蒙三个方面逐一考察了明清时期女教传统之衍变与才女文化之兴盛。〔2〕但实际上，这些女性——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多以姊妹相称，毫无疑问，亲属关系在她们的关系网中仍然占居主导地位。

曼素恩（Susan Mann）的研究显示，清代女子所受教育程度绝不仅限于“女诫”之类的道德说教文书，而是早已扩展至经史的学习，在士大夫家

① 对中国近代女学与女校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著作问世，比如梁瓯第、梁瓯霓：《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上海：正中书局，1936 年；程谔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但这一研究传统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得以重新接续，随后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1895—1945）》，台北：文史哲



庭,女孩的早期教育与其兄弟并无太大差异。^[3]但这种学习主要是家学,学习的场所仍在家中,“同学”仅限于姊妹兄弟。清代诗人袁枚与他众多女弟子的故事是个特例,他的40余名女弟子中多江南官宦士绅的妻妾女儿,“随园女弟子”群体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同门”为纽带的女性诗人群体。

17、18世纪发生在江南地区的这些变化为女子教育在19世纪出现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高彦颐和曼素恩的研究时段止于清代早期,但这种女性的交际网络实际一直在延续,直到19世纪50年代前后新式女学在江南出现,女子教育与女性社交网络的形态才出现大的转变。推动女子教育走出家门、成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教育一部分的主要推力来自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是女传教士——她们互称“姊妹”。

一、传教姊妹的推进

中国近代教会女校的创设常被溯自传教士郭实腊夫人(Mary Gutzlaff)于1834年在澳门创办的女塾——该校1839年因中英关系紧张,郭氏被逐离澳门而停办。容闳曾在该校借读,因此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了郭夫人所办该女塾的情况:

古夫人所设塾,本专教女生。其附设男塾,不过为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之预备耳。马礼逊学校发起于1835年,至1839年成立。未成立时,以生徒附属古夫人塾中,酌拨该校经费,以资补助,是予本马礼逊校学生而寄生于此者。^[4]

可见,澳门的这所女塾比容闳后来就读的马礼逊学校创办更早,而马礼逊学校通常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第一所专门为华人开办的教会学校。由此可见,在澳门,教会女校的设立比男校更早。

也有人认为十年后(1844年)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的爱尔德赛女士(Ms. Aldersey)在宁波创立的女塾才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校——该校在1845年招到了第一批15名学生,到1852年时学生规模达到50人。这一说法目前笔者能看到的最早出处是1935年褚季能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女学先声》一文。^[5]无论是澳门的女校,还是宁波的女塾,都由女传教士创设。

与澳门和宁波的情况类似,上海近代最早的女子学校亦由美国来华基督教女传教士创立,但至于上海第一所教会女校究竟是裨(俾)文女塾还是文纪女塾,向有争论,似无定论。以笔者目前所见资料判断,上海第一所女校应该是1850年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夫人以利莎(Eliza J. Gillete Bridgman)创办的裨文女校,校址位于老西门白云观,今上海方斜路。该校“开学之日为公历四月十五日。所收学生廿人全属走读。是年秋九月十五日秋季始业。宿舍已完全学生可住宿于校内”^[6]。

虽然裨文女校创立于1850年,但圣公会在上海的女子教育事业实际在这之前已经起步。上海的美国圣公会差会是1845年6月由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牧师所开创,与文牧师同时抵沪的还有文夫人和乔恩、莫尔斯两位女传教士,随后又有爱德华·赛牧师夫妇加入。1848年夏天,

出版社,1989年;黄新宪《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生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乔素玲《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吴民祥编著《浙江近代女子教育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徐宁《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1850—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汪晓慧《近代女子教育论争史:1895—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这类著作以往多通史少个案,不过近年来对女校的个案性研究成果亦有一定推进,比如张连红主编《金陵女子大学校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徐海宁《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等。上海市三女中近年集中推出的《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中西女中(1892—1952)》等书结合校史和口述回忆等,资料丰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2016年,全系列共6本。

① 详见王英志《性灵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本文讨论的基督教专指新教,天主教会不在讨论之列。

圣公会在苏州河北岸设立了一所学校，“有 46 名男生和 2 名女生……学生的年龄自 10 岁到 18 岁不等，由上文中两位女士直接监管和照顾”，而那 2 名女学生“上午由爱德华·赛夫人指导；其他时间由莫尔斯小姐督导”〔7〕。这份由裨治文牧师写给差会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圣公会在上海的教育事业——不仅女校——是由当时数量还非常少的女传教士们所开拓的。所以郭卫东认为“基督新教在华办学是从女子教育肇始”〔8〕，此言不虚。

1851 年，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琼司女士 (Emma Jones) 又在上海虹口礼拜堂后创办文纪女塾。以往研究习称 1881 年裨文与文纪两校合并，更名为圣玛利亚女校，黄素娥出任校长。这是因为裨治文夫人 1871 年去世前“遗嘱以校屋归于女公会”，因此在 1881 年前后女公会所办的文纪女塾就出面接收该校。但裨文女校只是部分并入圣玛利亚，余一部分仍在原址续办，到 1930 年代更是“购得吴淞地皮六十余亩。以为建筑新校舍之用”〔9〕。

1861 年，上海又迎来第三所教会女校，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 (John M. Farnham) 夫妇在南市创办清心女塾。清心草创之时校舍条件相当简陋，“范约翰夫人辟其位于南门陆家浜的住宅的一部分为校舍，创立女校，并另盖竹屋为女生学习烹饪之所”〔10〕。

早期的教会女校，如爱尔德赛在宁波所办女塾，招生的卖点就是食宿免费和教育免费，因此生源主要为通商口岸的贫苦民众。但是停留在简单启蒙层次的免费教会教育规模难以扩大，一旦差会支持不济，就不得不停办。因此，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慈善式教育开始向经营性教育转型，教会女校的服务对象转为中国城市中等以上富庶家庭。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教会女校已基本改为收费上学，教会女校的办学宗旨转为“给入学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11〕。到 1892 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

乐知 (Young John Allen) 在上海创办中西女塾 (MeTyeire School for Girls) 时，第一批入校的五名女生，也有说七名，就均为中等以上家庭女孩。

以往研究认为教会学校在招生对象上的转变主要得益于传教对象的拓展，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转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阶层急于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对热心传授西学知识技能传教士的态度发生转变，从早期的敌视怀疑转为友善接纳，这就使得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在 19 世纪 60 年代前后得以发生大的转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降，教会女学蓬勃发展。1869 年全国教会不包括天主教会女学生共计 576 人，1877 年增至 2064 人。根据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的统计，到 1902 年全国基督教会所办学校中女生已经增至 4373 人。

另据清朝学部统计，到 1907 年，除吉林、新疆和甘肃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女子学堂，总数达 428 所，在校生 15496 人，但非教会学校女生数仅 1500 人。到 1909 年时，教会女校学生数已超过 6.5 万人，可见其发展之迅猛。

这些教会女校的创办与来华女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早期美国来华女传教士数量较少，以男传教士夫人身份居多。但到 19 世纪下半叶，女性传教士数量持续增多。1876 年，来华传教士共 817 人，其中女性 407 人，略少于一半。到 1889 年，在总数 1296 人中女性传教士达 707 人，已经超过一半。到 1905 年，在 3445 名在华传教士中女性有 2002 名，几乎占到 2/3。这一变化的出现与美国国内女子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关系密切，彼时大学毕业女生在美国社会就业面狭窄，出国传教成了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途径。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不少单身女性来华传教，不再与男传教士产生人身依附关系。

有研究者形容西方来华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是“脱境”的状态，这种状态帮助她们在中国

① 参见《中西女塾启》，《万国公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号。

② 参见褚季能：《女学先声——中国妇女教育史话之一》，《东方杂志》1934 年第 31 卷第 7 号。

③ 参见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任保罗译，上海：广学会，1903 年，第 35 页。

④ 参见雷良波、陈阳风、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年，第 248 页。

⑤ 参见吕美颐：《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妇女中的传播及其影响》，李小江主编：《性别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第 230-251 页。



全国基督教会所办学校统计表(1902年)

学堂性质	数目	学生总数	女生数
大书院、书院	12	1814	96
天道院	66	1315	543
高中等学堂	166	6393	3509
工艺学堂	7	191	96
医学院	30	251	32
小孩察物学堂	6	194	97
初等蒙学	未详		
统计	257	10158	4373

数据来源: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任保罗译,上海:广学会,1903年,第34-35。

的宣教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性别平等空间,而这些理念与优势也通过她们所开创的女校空间得以传授给中国的学生们。从1890年起,在圣玛利亚女校校长职位上工作了30年的孙罗以(S. L. Dodson)就是这样的女传教士,“她认为教会女校应以恢复中国妇女这一被中国社会忽视的弱势性别群体的权利为目标,并主张妇女应拥有和男性相同的受教育的权利”〔12〕。并且反复强调申请入学的女生以不缠足为前提。正是这些在教内以“姊妹”相称,也称中国受众为“姊妹”的女传教士们,帮助中国女性们建立了新式的公共空间——女校,构建了新式的社交纽带——同学。

如果没有教会女校的创设,即便在通商口岸城市,19世纪的中国女孩接受新学教育的机会恐怕也很低。清政府在帝国晚期对于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努力不少,但对于女学基本没有考量。1904年通过的癸卯学制想要建立的仍然只是一个男性中心的教育体系,将女子教育完全排除在官办教育体系之外。

美国教会在华人妇女中传教办学,最初“为宗教事业。彼等盖即所谓圣经妇女,中国女子界中之宣传基督教者也”。教会女校除着力培育传教士夫人外,还想要培养“女会吏、圣经教师、牧师之助理人、宗教教育之领导者、宣传教义者及基督教青年会之书记”〔13〕。而到创办中西女塾时,

林乐知开始注意教育中国女学生们志气高尚、见识远大:“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丽落,而无所黏滞焉。”〔14〕正如长期担任中西女中校长的薛正所说,中西校名的含义是要“按美国教会办学的宗旨和教育内容的要求,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15〕。这样的办学理念在中西女中知名校友——宋氏三姐妹身上多少都打下了烙印。

二、个案:宋氏姊妹与上海教会女学

如果没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率先开拓的女子学校教育空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上海女孩想要接受正规的西学教育恐怕还不可能,更不要说她们的母亲倪珪贞了。“倪珪贞四五岁即读书家塾,九岁入学校,十五岁升西门裨文女学,十八岁毕业”〔16〕。1869年出生的倪珪贞是上海第一所教会女校——裨文女塾的毕业生,难怪项美丽(Emily Hahn)在《宋氏家族》中称倪珪贞在校期间,精算学,嗜西琴。〔17〕倪家常被提及的显赫家世是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子孙”,倪珪贞的父亲倪蕴山就是一名圣公会牧师。〔18〕倪蕴山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个海归好友——宋耀如、牛尚周和温秉忠。倪家另两个女儿的传记资料不易寻见,有说倪珪金(琴、清)系牛尚周夫人,当过教会学校的老师,曾在贝满教过书,大概可以推定与倪珪贞的教育水平相当。

对于宋氏三姐妹出国前在上海受教育的情况,以往的传记作品表述多有出入,包括出国时的年龄、出国前所读的学校、出国时的教育水平等,莫衷一是。多本西人所撰宋氏传记均称宋蔼龄五岁时被送入中西女塾,但因为翻译的原因,在这些传记中“中西女塾”常被译为“马克谛耶学校”。杨者圣在宋蔼龄传记里也照搬了这一说法。〔19〕“马克谛耶”这个别扭的音译名来自中西女塾的英文校名“McTyeire School”,该校自己使用的中译名是“墨梯女校”。

① 详见冯进对金陵女子学院的研究, Jin Feng, *The Making of a Family Saga: Ginling Colle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② 包括尤恩森:《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4-15页;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李豫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50页;斯特林·西格雷夫:《宋氏家族秘闻》,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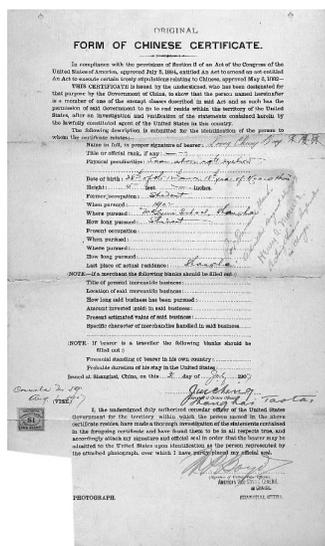


图1 宋庆龄首次赴美护照(正本)反面, 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至于宋庆龄是什么时候进入中西女塾的, 学界存在争议。尚明轩在 1986 年版的《宋庆龄年谱》中记载宋庆龄 1900 年 7 岁时, “入中西女塾 (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 读书。性格文静, 学习用功, 善思考问题, 对英语和文艺尤为喜爱, 曾参加该校幼稚园的游艺会演出, 颇受观众赞扬”^[20]。在 2009 年新版的《宋庆龄年谱长编》中, 这一说法被修订为“1900 年七岁入家塾读书”^[21]。这一修订的主要依据应该是 1997 年披露的一封宋庆龄 1921 年 4 月 28 日写给友人白赛脱的信, 在这封信后附有宋庆龄亲笔撰写的本人生平简史。在这个自述中, 宋庆龄称自己“在家读书, 一直到 12 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 我在中西女塾就读, 直至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22]。所以, 按照这份自述, 宋庆龄是 1904 年 11 周岁即 12 虚岁时才进入中西女塾就读的, 而非 1900 年 7 岁; 到 1907 年考取公费资助出洋留学, 宋庆龄在中西女塾大概学习了三年时间。

从《上海中西女塾章程》来看, 早期中西女塾学制十年, 宋庆龄只能算是肄业, 而非毕业。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主持 1907 年度江宁提学司出国留学考试的严复对该年应考女生的学业水平——包括宋庆龄在内, 一律评价不佳。

女子程度尤浅, 接到题纸, 与之对觑, 不能下笔; 英文勉强写出半板, 而文法亦多支离。^[23]

宋庆龄在自述中称自己 12 岁 (1904) 才进入中西女塾, 但在她的赴美护照上所填写的入学时间却是 1902 年, 如图一所示, 不免令人怀疑在进入中西女塾前她是否还在其他学校就读过。有些传记资料——尤其是关于宋庆龄的传记资料——提到, 宋家女儿还曾经就读于湖郡女塾幼稚园、三一堂女塾等处。

在《宋庆龄年谱长编》中, 尚明轩还考证宋美龄“5 岁之前, 在家中学习英语, 5 岁在圣约翰大学少年班注册入学, 因太过年幼不久即离开学校, 一直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24]。从宋子文和宋子安等宋家儿子的传记资料来看, 他们在进入圣约翰学院之前均受业于家塾; 因此不难理解宋庆龄、宋美龄曾经较长时间在家塾接受教育。比宋氏姐妹略年长的南京女子蔡苏娟——后来成了女传教士和作家——在回忆录中就称, “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 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 到了十多岁, 女孩就分开, 另请女教师教书、女红和音乐”^[25]。可见, 当时殷实之家的女孩与兄弟们一起在家塾读书是普遍现象。

至于宋美龄出国前是否曾就读于中西女塾, 各种传记中的说法亦有出入。1907 年, 宋美龄赴美留学时英文护照上所填学校为“McTyeire School”, 入学时间为 1904 年, 如图 2 所示。1919 年 11 月, 中西女塾同学会成立时宋蔼龄当选会长, 宋美龄出任书记, 宋氏姐妹均积极参与中西女塾校友会的活动, 以此推测, 宋家小妹应该亦曾就读于中西女塾, 但时间可能很短。

受限于史料, 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对宋氏姐妹

①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编:《宋庆龄在上海》,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0 年, 第 5-6 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 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沈苏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第 29 页; 锻炼:《从悦来女塾到湖郡女塾——关于宋庆龄入学问题的一条重要线索》,《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12 年第 4 期。

② 参见《中西女塾同学会成立纪》,《申报》1919 年 11 月 6 日, 第三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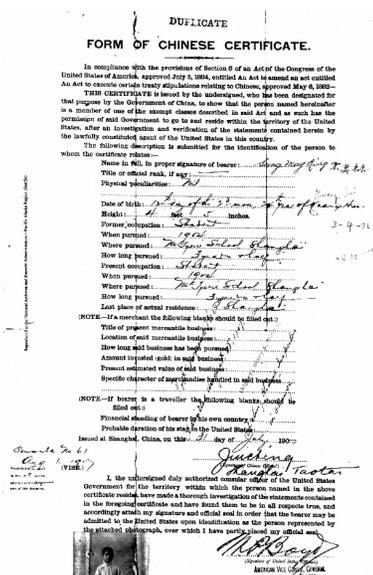


图2 宋美龄首次赴美护照副本反面，现存美国西雅图国家档案馆

在上海的求学经历得出非常清晰可靠的结论，但从以上梳理至少可以判断宋氏三姐妹在赴美留学前，美龄仅接受过短暂的正规学校教育，庆龄所受正规学校训练大概不过三年，惟蔼龄在中西女塾求学时间最长。从宋氏三姐妹和她们母亲的例子来看，如果没有教会女校的创设，即便在通商口岸城市，19世纪的中国女孩接受新学教育的机会恐怕也很低。

三、华人传教士亲属圈与早期上海教会女学

本节关注的是像宋家母女这样一批生活在上海的特殊女性群体，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华人传教士的妻女或儿媳，笔者试图从她们的求学经历来看早期教会女校的发展。不过她们的传记资料往往语焉不详，寻获不易，本文只能列举些许，错讹难免。

上文提到的圣玛利亚女校校长黄素娥是美国圣公会第一位受洗华人、第一位华人教牧黄光彩的女儿，而黄光彩亦是文惠廉在华传教的第一位

助手，黄光彩的妻子据称是文纪女塾第一位受洗的基督徒学生。圣玛利亚女校第一位总监督、女传教士文海莉 (Henrietta F. Harris) 是小文惠廉主教的夫人，她在教务报告中对黄素娥亦是称赞有加，认为她在圣玛利亚设校之初就成功地组织了一个以中国妇女为主体的校务管理团队，这个团队包括一名助理校监、一名助理教师，还有担任地理教师的黄素娥的妹妹黄阿美。除此之外，黄素娥还请到了颜永京的夫人戚氏和华人女传教士魏氏担任圣玛利亚女校的班级导师。

1892年中西女塾在上海正式开学时，只招到了五名学生：朝鲜贵族尹致昊的夫人马爱芳，黄佐庭夫人、叶可良夫人、成颂文夫人和曹芳云。黄佐庭是黄素娥的弟弟，他的夫人叫薛葩。190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时黄佐庭被选为会长，1911年赴美担任中国留美学生监督。黄佐庭夫人则担任过中国留美女学监，1908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时出任董事会中国籍会长，是上海地区最活跃的妇女活动家之一。1919年，黄佐庭在华盛顿为保护公款惨遭留学生万氏兄弟枪杀身亡。美国当局发给家属一笔抚恤金，薛葩用这笔抚恤金在赫德路60号，今上海常德路，建造了两幢四层联体大洋房，一部分家属自住，大部分用来开办黄氏女塾。帮助母亲创设黄氏女塾的是黄家的两个女儿黄倩仪和黄倩鸿，她们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波士顿新英伦音乐学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 学士。从黄素娥开始，黄家的女儿和媳妇们对上海近代女学的推动代代相传。

中西女塾首批五名学生中唯一以本名传世的曹芳云 (芸) 是曹子实的女儿。曹子实是监理会华籍传教士，也是东吴大学创始人之一。曹芳云与宋庆龄一样，1907年受江宁府的资助赴美留学，是中国第一批公费留美女生之一。

与早期被传教士们或收养或资助带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如金雅妹、康爱德等多

① 参见罗元旭《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1页。

② 尹致昊，也记作尹子昊，是韩国独立运动领袖。1884年因韩国甲申政变失败流亡至上海，进入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读书。尹致昊在上海两年后赴美留学，后又回到中西学院教书，直到1895年罪名解除后才回到韩国。

③ 参见江宗海《上海中西女塾记》，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6页。新出版的该校校史认为首批招到了7位女生，两周后又招到了2位，到1892年年底已经有了16名学生，见陈瑾瑜主编《中西女中(1892~1952)》，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29页。

数出身贫寒不同，曹芳云、宋庆龄这样一批从国内的教会女校毕业或肄业后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女生，她们的家庭背景多为口岸城市的成功商人如宋耀如、专业人士如曹子实或士绅官僚如与曹芳云同期赴美留学的王季苕的父亲王颂蔚，曾任户部主事、军机章京。到19世纪末，在教育上培养女儿，让女儿接受西学教育已经成为通商口岸中上等家庭给予女儿的最好嫁妆。

1892年成立的中西女塾到1900年才首次举行毕业典礼，“计毕业生三人，即曹孙素馨女士、舒侯臣夫人，史凤宝女士，皆占教育界重要位置”〔26〕。孙素馨是曹复康即曹子实次子的夫人，后肄业于金陵神道女学，曾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上海中华国内播道会理事部职员和上海培成女学董事等职。史凤宝1910年在美国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是中西女中附属中西小学的首任校长。其妹史凤珠1905年毕业于中西女塾，1907年自费赴美学习音乐，回国后担任中西女塾音乐教员。这里的曹家姐妹、史家姐妹与宋氏姐妹一样，前赴后继进入中西女塾求学，又从中西女塾走向国外。

中西女塾首批毕业生中的舒侯臣夫人，就是颜永京的女儿颜庆莲。上文提到的曹子实正是颜永京的妹夫，也就是说曹芳云、曹丽云与颜庆莲是表姐妹。颜惠庆在回忆录里称赞父亲对待子女教育一律平等，坚决反对给女儿缠足。可见，当时的华人传教士们不仅重视培养女儿，而且着力扶持女学。

结语：由姊妹而同学的转变

教会女校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进入中国，女传教士们将她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与中国女校这片发挥她们自主性的性别空间有机结合，挑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女教传统，开创了“女子有才始有德”的新型性别观。由文海莉、黄素娥、颜永京夫人这样的中美女教士们共同组成的女校经营团队，将明清时代“闺塾师”们所开拓的女

性文人的社会空间进一步拓展。1899年，黄素娥在圣玛利亚女校成立学生组织“清心会”——第一批22名会员，包括在读学生和毕业校友。〔27〕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女校友组织，女学生藉由女校所建立起来的相互扶持的社交网络在毕业后仍然得以延续与拓展。宋蔼龄和宋美龄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一直热心中西女塾（中）校友会的工作，宋蔼龄更是出任校友会会长；中西女塾（中）的校友们日后也成为宋氏姐妹政治生活中可以信赖、不可忽视的倚靠力量。1915年时，由裨文女校发起，计划在上海成立“中西女学联合会”〔28〕，女校与女校之间的联合，不同女校间师生的联络也得以建立，由“姊妹”而“同学”的女生社交渠道，藉由女学的发展日渐拓展。

圣玛利亚女校、中西女塾等教会女校的教育帮助像宋氏三姐妹、颜庆莲、徐奕蓁这样的女学生们树立了妇女不只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在婚后她们与丈夫之间建立了互相尊重、彼此扶持的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与康爱德、石美玉这些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多数终生不嫁、奉献事业和教会不同，宋氏三姐妹这一代的教会学校女生们，女校毕业甚至留学归国后，大多数人都嫁给了跟她们父亲类似的人：律师、医生、工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成功的商人，当然也有牧师，成为中国新兴核心家庭的核心。即便要强如徐亦蓁，1924年与牛惠生结婚后，首先扮演的是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正如叶维丽所说的，宋氏三姐妹这一代女留学生反而成了“新时代的贤妻良母”，传统的女性领域没有受到质疑，但认为女人智力低下的观念因女学的拓展而受到有力挑战，这些女校学生们的优良表现证明了男女天赋相当，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她们并没有要求进入男人的世界，而是仍然退回到贤妻良母的角色。这大概是创立教会女校、想要在中国构建新型性别关系的女传教士们始料未及的，但恐怕这也正符合了中国的官员士绅以及外籍、华籍男传教士们的共同愿望：女校是为了培养好的妻子和母亲，不是为了挑战

①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宁文史资料》第6辑，上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63页。

② 参见高春明主编：《上海艺术史》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③ 有关“新时代贤妻良母”的论述参见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周子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5-134页。



传统的性别秩序。

〔参考文献〕

〔1〕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2〕李国彤：《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Susan Man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in the Mid Ch'ing Period," B. Elman & A. Woodside 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20-27.

〔4〕容闳：《西学东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4页。

〔5〕褚季能：《女学先声——中国妇女教育史话之一》，《东方杂志》第31卷1934年第7号。

〔6〕〔9〕《裨文女子中学简史》，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44-245、244-245页。

〔7〕E. C. 裨治文：《我所见到的上海（续）》，张岚主编：《都会遗踪·沪城往昔追忆》，钟鼎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147-152页。

〔8〕郭卫东：《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

〔10〕董涤尘、锺寿芝：《前清心女中校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3页。

〔11〕C. W. Master, "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ad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Record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456-476.

〔12〕徐永初、陈瑾瑜主编：《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13〕《基督教女子教育的起源与作用》，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41页。

〔14〕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15〕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7页。

〔16〕《宋母倪太夫人讣告》有关记载：行述》，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宋耀如档案文献汇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127页。

〔17〕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李豫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18〕朱玖琳：《倪蕴山公纪念碑及其人》，《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2年第3期。

〔19〕杨者圣：《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20〕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21〕〔24〕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上）（1893—194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11页。

〔22〕《宋庆龄自述》，马晶华译：《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23〕朱玖琳：《宋庆龄与近代中国首批官费留美女生》，《世纪》2012年第6期。

〔25〕蔡苏娟：《暗室之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6〕江宗海：《上海中西女塾记》，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7页。

〔27〕"Steva L. Dodson's letter to Jnlin C. Emery of the Board," *The Spirit of Missions* vol.57, (May 1892) pp. 196-197.

〔28〕《徐君善祥转致裨文女学校长拟组织中西女学联合会书》、《致上海各女学校书》，《教育研究》（上海）1915年第19期。

【责任编辑：冯 静】